

穩定壓倒一切？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大陸天津市的發展模式探討

陳 蓉 怡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成長機器模式能否通則化解釋所有中國大陸城市的發展軌跡？奠基於分權化的背景以及預設城市的競爭性之下，成長機器概念被大量的運用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然而，這樣的推論必須考量到中國大陸幹部特殊的政績機會主義以及城市初始條件的限制；本文以天津為個案，提出超穩定機器的城市發展模式，研究顯示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的天津當局，更強調社會維穩甚於經濟增長，對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調控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本文認為，天津個案可以與成長機器、發展型國家甚至是企業家型國家等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理論框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另兩個有趣的實務問題則是，面對全新的政治生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轉化？中共當局已然強調未來將不再以 GDP 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值得觀察。

關鍵詞：超穩定機器、成長機器、天津、路徑依賴

* * *

壹、前 言

天津是中國大陸城市發展史中最具戲劇性的個案。天津曾經是中國第二大商業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1937 年，天津的貿易額已占全國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擁有包括 12 家國內銀行的總行與 270 多家國內外保險機構，還有功能完備的證券交易所。天津也是通渠之地，海運、航運發達，在全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當時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說法。1949 年後天津轉型成為工業中心，製造業亦曾喧赫一時。1978 年的經濟改革促使全中國的沿海城市經濟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增長，此時期的天津發展卻開始變得緩慢。1990 年代中期的時候，天津不論在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消費能力與居民收入等指標上，與上海已有明顯差距。

為何天津的發展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變化？本文認為天津的個案說明了傳統研究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理論的侷限性。過去的所謂「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 模式，強調地方政府從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被動角色，轉變成更加企業化的利益主體。發展地方經濟、增強城市競爭力成為地方政府的核心理念。然而，1980 年代的天津市政府嚴格執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更強調維穩甚於經濟成長，調控通貨膨脹及失業率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與成長機器模式所強調追求產業壯大有所不同。^①

因此，本文以改革開放初期的天津為案例，以歷史、田野訪談資料及經濟數據，提出「超穩定機器」的中國大陸城市發展模式，強調地方政府為降低經濟轉軌過程中可能造成的震盪，以追求低失業率與低物價為目標，提供補貼協助企業取得原材料，並規避破產的危機；而企業則配合政府繼續維持計畫生產，以及人為的刻意壓低物價漲幅。就與職工關係之間而言，企業要求職工接受低薪資的安排，但同時仍持續提供住房等社會福利性措施。因此天津超穩定機器的運作具體呈現出三個面向，國有企業仍然作為國家權力的延伸，繼續承擔政治與社會功能；政府壟斷資源分配，抵制市場力量的進入；以及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外國資本所可能對傳統經濟秩序的干擾。

本文認為，由於改革初期的誘因與體制限制的差異，使中國大陸的城市發展模式呈現多元風貌。現存文獻多以珠江三角洲或者長江三角洲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相對之下，環渤海區域城市發展的討論則相對缺乏。因此，本文試圖以天津作為個案，研究時段則集中於 1980~1990 年代，透過理論對話與經驗證據，討論其穩定至上的發展模式，並在歷史制度主義概念引導下，解釋天津發展的路徑依賴與制度遺產，希冀進一步充實現有研究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文獻。此外，當天津濱海新區進入國家戰略階段，原來的天津超穩定機器在轉型成為成長機器的過程中，面對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生態，地方政府行為的轉化值得觀察（王信賢、涂秀玲 2014, 34-61；Wang, Tseng and Zheng 2015, 1-13）；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即強調未來中國大陸將不再以經濟成長速度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貳、成長機器之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

由 Molotch (1976) 所提出的成長機器，將城市視為由菁英間所共同組成、互為支援並以追求城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多面向維度，驅動城市以其意志，朝擴張地方經濟與積累財富方向邁進。^②基於經濟成長帶來的利益，將城市中的政治、工商菁英甚至地

註① 每年國家統計局的社會治安綜合指數綜合評定，天津都是全國社會治安最好地區之一。參見趙榮君、吳金星、劉健（2006）及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7）。

註② 既然城市政治的本質來自交易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衝突，因此在強調成長聯盟的同時，Molotch 從未忽略反成長聯盟的存在，只是當兩個聯盟發生衝突時，幾乎均以成長聯盟的勝利做結。另一方面，Molotch 同時注意到，即使城市能夠吸引外來資本投資，卻未必能成功轉化成為都市就業的成長，白領菁英間的跨界流動特性注定了資本的進入並不特別有利於本地人才的參與。換言之，城市成長政策對於是否有益於城市的經濟成長應該是高度存疑的。

方媒體、大學等具地方附著性的附屬行為者結合在一起。成長機器的概念有幾個重要的預設前提：第一，追求經濟增長將凌駕於重分配之上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題；其次，地方政府與各類型資本之間所組成的公私聯盟成為推進地方經濟的手段，透過都市更新而逐利，因此地方政治環繞著土地發展的議題開展（Logan, Whaley and Crowder 1997, 604）。準此，都市企業家型主義成為成長機器中重要的核心概念。

奠基於分權化的背景以及城市競爭性的存在，成長機器聯盟概念被大量的運用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改革開放後發展環境與制度的變遷，地方政府對外資更加青睞並將其視作地方發展的主要動力源，使得中國城市政府選擇了高度趨利型的企業化治理方式（He and Wu 2005, 1-23）。地方政府既有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強烈願望，又有追求行政能力極大化與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短期化的需求，同時他們擁有對行政資源、壟斷性競爭資源（如土地）的特權，而企業為了謀取地方保護和汲取收益，也希望成為地方政府的合作者。地方政府遂與城市中諸多經濟發展主體形成了複雜而有力的「城市成長機器」（殷潔、張京祥、羅小龍 2006, 38）。其中政治菁英在後社會主義國家中成為成長機器的啟動核心，與西方成長機器原始理論中，國家僅僅作為被動角色有極大差異。1978 年後的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成為了區域競爭的主體（Chien 2013, 173-196; Wang and Leng 2011），從對企業的管制者身分蛻變而為促進者的存在，其角色與職能從管理型向企業家型本質的轉變，被視為經濟高速起飛的驅動力（Wang and Leng 2013, 222）。

成長機器抑或是城市企業家型主義，確實精闢的指出了上海或者深圳等沿海城市，在城市經營或者城市營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如何結合共同運作創造出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空間。但若試圖以其通則化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則可能出現相當的侷限性與不完整性。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存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成長機器的制約性，監管著城市發展的步調與方向，包括所屬區域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必然會影響都市政治的運作。林初昇（2002, 299-316）及張樂因（2003, 1549-1572）便重申中央政府對於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強調城市是國家在區域發展或者國家策略的考量下，所驅動的經濟或者社會轉型中心。城市功能與定位將因應不同歷史環境而有變異（Han 2000, 2091-2112; Ma 2002, 1545-69）。這與西方成長機器提出的背景源自於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與投資體制改革變化下，中央持續減少對地方的投資，但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獨立稅源與自主決策權，刺激其發展經濟的動力有極大不同。

透過幹部晉升、金融機器、國家政策、制度改革等工具，中央可以直接或間接對地方的成長議題產生影響。尤其在黨管幹部（nomenklatura）原則下（Burns 1994, 459-461），中國大陸形成獨樹一幟的人事任命制。上級領導對於下屬幹部的考核，決定了該幹部是否能夠晉升。這種方式排除了選舉制度與民意匯集的機制，而端賴於幹部是否能具備良好的「政績」，來獲得上級領導的拔擢（蔡文軒 2010, 144）。此類有別於西方民主機制的幹部任命方式，學者稱為幹部的「向上問責制」（upward accountability），對上級而非對選民負責（Chien 2010, 69-89），成為中西方成長機器之間最大的差異。Blanchard 及 Shleifer（2001）也強調藉由地方政府經濟增長下的財

政分成並不足以解釋中、蘇政府地方行為上的差異，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於中國始終維持強大的政治集權。這使得中央政府有足夠權威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遊戲的規則。其中中央掌握人事權或晉升規則成爲關鍵，從根本上可以對地方官員形成制約；此種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不對稱的分權，指涉的是中央政府一方面向地方下放了大量權力，主要是財政分權及行政放權，但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可透過人事管理方式對地方政府施加更強有力的控制（Chien 2010）。

因此，就中國大陸而言，城市系統的存在政治性大於經濟性，中央對於個別區域城市有其定位與要求，每個省際之間的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諸如人事的調動到財政資源的重分配，爲地方領導創造出了不同的誘因與限制。除了中央所給予的機會或者限制，其他包括地方的初始條件、領導個人的理念與抱負等因素，都可能影響不同的省域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Donaldson（2009）就認爲，貴州領導在 1978 年以後所採行的是一種微觀（micro-oriented）的政策途徑，傾向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扶貧政策，確保偏鄉孩童的公平受教權，即使以犧牲經濟成長爲代價也在所不惜。這顯示在經濟不佳的地區，領導人並非不重視經濟發展，但或因成效難以短期內提升，因此拼穩定的政績就變得非常重要。1989 年時鄧小平已然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可見綜治維穩工作是在追求 GDP 增長外，另一個可資追求的政績考核指標，亦即所謂的政績機會主義。^③

超穩定機器的概念最早曾由吳縛龍所提出，但如何具體操作化其特質則相對較不明確，其認爲毛澤東時期，單位對所有職工綜合性福利措施的提供，以及國家透過這種職工對單位的組織性依賴，實行對社會的緊密管理，作爲兩個軸心，支撐了都市中超穩定（super stable）與可治理的社會之存在（Wu 2002, 1073）。在此過程中，國家力量通過資源分配交換工人的忠誠與馴服，工人則爲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機會與福利占有。這種超穩定社會的基礎，在經濟改革引進廠長責任制後被明顯的削弱。筆者透過對於天津田野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國家力量與單位組織間，以及單位組織與職工間的雙重互賴關係，在改革開放年代仍持續建構天津超穩定機器（Pro-Stability Machine）的出現。

超穩定機器應具體呈現出以下特質：社會政策取代經濟計畫作爲主要城市議程，地方政府展現出管理家型而非企業家型的特質，致力於調控通貨膨脹幅度、保持城市完全就業狀態以及提供給予職工最基本的醫療與退休保障。因此，國有企業仍然作爲國家權力的延伸，繼續承擔政治與社會功能。1980 年代的天津市政府以追求低物價、低失業率爲目標，即使在整個大環境放開物價的背景下，市政府依然透過大量補貼戮力降低物價與限制工資的增長，進行企業合併避免體質不良的企業瀕臨破產，同時避免外來資本進入干擾城市原有經濟秩序。關於成長機器及超穩定機器的比較，參見下

註③ 中共著重的政績，其一爲經濟發展，其二爲社會維穩，在幹部任期不穩定以及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會從這兩種政績進行理性選擇，追求最易於達成的政績，參見蔡文軒（2010, 115）。

表 1。④

表 1 成長機器與超穩定機器的比較

	成長機器	超穩定機器
主要行爲者	政治菁英、經濟菁英、文化菁英	以政治菁英爲主
政府角色	企業家型特質	管理家型特質
城市優先議程	經濟增長	社會穩定、社會秩序
重視的經濟指標	GDP增長	通貨膨脹率、失業率
對非公有資本態度	歡迎	防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筆者認爲，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天津在發展經濟條件上相對其他沿海城市並不突出，主要源於中央—地方關係制約下城市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亦即 1949 年後中央對天津的城市定位與城市要求，以及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緒，特別是國家項目的投入、財政上解的指標；在政績機會主義考量下，使得 1980 年代的天津領導升遷動機並未使天津政府唯經濟發展是從。換言之，由於初始發展不同 (Solinger 1996; Li 1997, Rithmire 2014, 175)，包括國有企業多、國家項目投入有限、同時地方作爲財政上繳大戶，選擇快速改革國有企業等經濟建設成本較高，^⑤導致政治菁英在考慮升遷動機下，傾向不做風險大的政策投資探索，而將選擇綜治維穩作爲發展目標。1980 年代低失業率、低物價的政策選擇，在缺乏足夠力量足以挑戰制度慣性下，由此形成的超穩定方針即使進入 1990 年代依然被有意識的延續下去 (Peters 2012, 73)。準此，天津 1980-1990 年代的城市治理經驗因此充滿路徑依賴的痕跡。

參、企業家型傳統的褪逝與毛時期的政治經濟遺緒

中共建政後，外來幹部掌握天津中樞，奉中央指示開始進行城市改造。城市定位奠基於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天津要成爲社會主義的城市，城市建設必須充分爲工業

註④ 「成長機器」與「超穩定機器」在概念上雖屬相對，然而，在實際發展上兩者並非完全互斥，亦即作者認爲在中國大陸城市發展過程中，兩種模式都是存在的，並非類別之差而僅是程度之別，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天津並非不要發展，而是在追求發展之中更重視穩定作爲一種前提，特別是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因此物價、失業率、治安成爲工作重點。李瑞環本人也不斷強調，堅定穩定發展是天津的一條重要經驗，先把社會穩定保住，取得的速度才是實在的速度。因此在選擇經濟發展方針時，天津會走向一條相對穩妥的發展策略，包括避開成本較高的國企改革，選擇熟悉的第二產業而非第三產業作爲發展重點，在訪談過程中，也有許多受訪者提及經濟工作確實不是當時天津領導的強項，對比沿海其他城市，整個城市開放程度較低。

註⑤ 整個 1990 年代中期以前，全市有超過一半的職工都任職於國有企業，即使到 2000 年，此一比例仍然高達 40.3%。

生產創造便利條件；第二，天津必須為國家戰略而服務。^⑥在戰備封鎖的狀態下，天津的港口優勢幾乎完全喪失，在轉型成為生產型城市的過程中，強化天津作為工業基地的定位，商貿金融等第三產業發展則急速弱化。

在三反五反運動以後，天津原有的工商業基礎徹底完成改造工作。所造成的結果是所謂企業家型的傳統被有意識的掃除，整個結構排序開始從以三產業為主向二產業為主轉化。當時正是全國大上工業的時期，爭項目搶項目幾乎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唯一手段，天津也從此由一個依賴商貿自給自足型的城市，轉變成為一個高度依賴於中央資源投入的城市。

天津在 1949 年至改革開放前的發展歷程可粗估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分別有其特殊政經狀況而不利其工業的增長。第一階段是 1949 年到 1957 年，備戰的考量下，中央實行沿海不建策略，156 個重點項目，沒有在天津安排任何一個，一切基礎建設以養護為主，不再進行新建，節省資金與幹部用以支援國家重工業建設。^⑦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天津投入的基礎建設金額是 8.97 億元，同時間北京是 40.7 億元，上海也有 14.3 億元。天津一方面必須為國家新建企業承制機器設備，提供生產資料，培訓並輸送人才，它方面必須生產生活日用品，供應全國人民需要（作者訪談，2012/11/05）。第二階段從 1958 年到 1966 年底共八年，天津併入河北省，從直轄市身分降為省會地位，無論在安排項目、調撥資金到各項事業的開支經費都大幅縮減，為建設大小三線，天津大型工業分散或者內遷，進一步削弱天津基礎工業實力。^⑧

1967 年到 1978 年間作為第三階段，由於鄰近北京，天津成為文革重災區，又遭逢地震破壞，直到 1980 年代初期，才緩慢恢復原有的生產水準（聶璧初 2004, 147）。這個階段天津在基礎建設與新增固定資產投入金額上，分別只有北京的二分之一與上海的三分之一水準（聶璧初 2004, 115-116）。^⑨進入六五時期後，上海的職工人數與固定資產投資是天津的兩倍，工業總產值是天津的三倍，利稅為天津的四倍。1949 年後徹底改變了天津的歷史軌跡，一方面必須多出產品、多繳積累，他方面獲得國家投入卻相當有限，大量資金上繳而工業發展有效資本投入卻不足，只能依賴自身調整改組，挖潛改造、填平補齊發展（吳敬華 1991, 197）。

一位受訪者強調：「能不能當政治局委員，對於城市發展很關鍵（作者訪談，2011/09/30）」，中央項目投資不足與天津的政治實力有相當的關聯性，1978 年改革

註⑥ 參見天津市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1994, 70-71）。

註⑦ 原先安排了 115 廠項目在天津，天津也十分重視，派任當時的工業局長李中垣擔任廠長一職，但受到沿海不建的影響，該廠後來舉廠遷移至陝西。參見宋杰（2004, 215）。平津戰役號稱中共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相對於北京與上海，天津損傷最為慘重。卻受限於支援國家建設影響，並未太著力於市容重整。以至於在唐山大地震後，中共同務院副總理萬里至天津視察時提及，天津是他看過的城市中最亂的一個。

註⑧ 當時天津有 300 多個企業遷移到內地，規模甚至遠大於上海。上海距離北京遠成為了自身的優勢，畢竟當時在南方仍然需要保留一個經濟中心。作者訪談（2011/09/26-2）。

註⑨ 1980 年代初，天津的工業產值從 1949 年的排名第三下降到排名第十一，出口地位從排名第二下降到排名第九。參見萬民（2004, 77）。

開放以前，天津黨政幹部的政治實力顯然無法與北京及上海相肋，以一五計畫時期相比較，當時天津的市委書記黃火青僅是候補中央委員的身分，同時期的北京彭真與上海的陳毅或者柯慶施都是政治局委員。再以文革時期為例，天津的解學恭是中央委員，同時期的北京吳德是政治局委員，上海的張春橋則是政治局常委。1978 年後即使有機會進入政治局排序也往往較為偏後，無法取得重要職位，李瑞環在 1993 年出任全國政協主席即是明例。從表 2 中也可以發現，上海與北京市委書記往往在中共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地因此成為典型中共高層幹部的培訓基地。反之，具備天津背景的領導幹部在職涯中的發展與升遷卻相當受限。幹部升遷的受限造成的最大問題是相對於其他省市，項目在中央走的時候容易受到打壓（王嘉州 2009, 111），天津只能靠自身積累發展，無法利用政治地位謀取資源，尤其在計劃經濟時期（1953~1980），中央作為資源的主要壟斷者，這種對天津的分配不利尤為明顯。^⑩

表 2 直轄市歷任市委書記仕途表（1949~2012）

職涯最高職位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慶
政治局常委	2	2	5	1
政治局委員	7	3	7	2
政治局候補委員	1	0	0	0
中央委員	2	7	5	2

說明：重慶成為直轄市時間較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舉例而言，天津在三五計畫之前沒有任何的大中型項目，同時期的北京共有 148 項建設在動工，上海也獲得國家支援 46 項工業項目。此後每個時期，天津的大中型項目數僅以個位數方式增長。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天津的投入略有增加，但遠遠低於北京與上海，^⑪以工業投資超過 10 億元以上的特大項目來說，天津只有大港油田和石化公司，先後收為中央企業後，天津回歸沒有任何特大項目的困境。^⑫受訪者提及，許多

註⑩ 天津東三省都是國有經濟為主導，對中央政府依賴性高。跟南方不一樣，南方反而不希望政府管很多，作者訪談，2012/10/21；計委是中央委員，市委書記也是中央委員，他沒有理由聽天津的，市委書記張立昌有事找鐵道部長人家也不理他，「連找個司長談事情都有困難（作者訪談，2011/09/26-2）」；天津雖長期作為政治實力孱弱下的受害者，但當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市裡一把手亦進入政治局後，天津也搖身一變成爲這種政治力量下的受益者，據受訪者表示市委書記張立昌得知自己進入政治局時，第一個反應是他可以去要項目了，另外原來河北曹妃甸提出建新港希望中央支持，但因為天津要建南港，因此改支持天津南港（作者訪談，2011/09/30、2012/10/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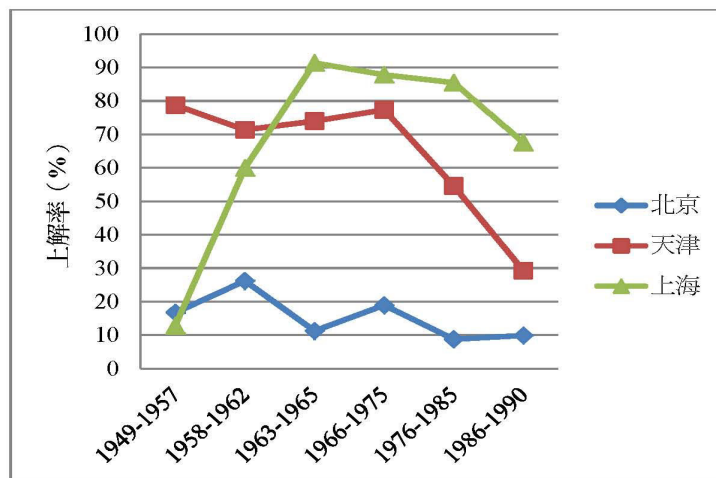
註⑪ 尤其北京的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一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三個直轄市中北京經濟增長對國家依賴程度最高，相對而言，天津依賴程度最小，參見王樹春、王常柏（2005, 50）。

註⑫ 當然天津本身也有其項目選擇上的問題，天津精細化工屬於全國實力較強的工業產品，精細化工所需原料、能源也較小，技術密集度與附加價值高，對其他產品帶動作用大，天津此類產品長期以來都保有一定競爭力，但對當局而言，投資大、產值高的大型石化項目仍較受青睞，反之投資規模小的化工項目便相對不獲重視，石油工業投入比重高，尤其是在開採部分，對後續加工項目投資較少，但結果是石油產值占全市工業比重偏低，無法為城市提供積累，反而造成負擔。參見杜廈（1986, 13）及作者訪談，2011/09/27。

大項目，「不能說刻意不放在天津，但結果就是不在天津，可能天津、上海、深圳都在爭取，比較結果就在上海（作者訪談，2011/10/12）」。

另一個對天津相對不利的狀況是天津的財政上解任務，1949 年後，天津每年都必須承擔上解支出的任務，1949 年至 1990 年天津市累計上解中央款 6,079,492 萬元，相當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 60%與同期地方財政總支出的 113.63%。尤其從 1953 年到 1979 年之間，天津的財政資金淨流出量占其收入總額的 71.8%，僅次於上海的 85.4%。^⑬即使在 1970 年代後北京市綜合實力已超越天津，天津在年均上解的數字上仍年年高於北京。天津的財政貢獻度從圖 1 中看得更為明顯，上海從 1960 年代後才成為中央上繳財政收入的地區。但從 1949 年到 1975 年，天津每年都上解了超過 70%的地方財政收入。1976 年唐山大地震天津遭遇重創，天津的財政提留率仍然為負值，1988 年後，東部地區的福建、山東、廣東等經濟迅速增長的省分成為不上繳財政的地區，天津持續保留財政上繳大戶的身分，1993 年，亦即分稅制實施前一年，僅次於上海，上繳率排名全國第二（姜承昊 1997, 37）。

圖 1 直轄市上解支出占財政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北京志》、《天津通志》、《上海財政稅務志》，筆者自行整理。

註^⑬ 這裡一個必須強調的重點是，上海財政資金淨流出量高於天津，為何上海可以發展如此優越，而天津卻沒有？筆者認為上海相較於天津，從 1960 年代以後才成為財政上繳大戶，而天津則自 1949 年開始每年便開始承受龐大上解壓力，除此之外，上海從一五時期開始就獲得不少國家提供的重點項目，進入 1990 年代，浦東的發展是中央與地方合作發展的重點地區，改革開放以後上海蓄積的市場力量也比較成熟，但天津在三反五反運動成為重災區後，基本上市場力量已經相當微弱。許多受訪者也強調上海受到中央的支持，是上海經濟得以快速飛躍的一個關鍵因素，一位受訪者提到：「至少從江澤民開始，中央對上海的支持度就很高嘛」。另一位受訪者則提及：「那時要求各部委都能往浦東投錢（作者訪談，2012/10/24-2）。張立昌推大無縫鋼鐵廠，當時也是考量天津都沒有大項目，上面長期不批，都認為天津沒條件，但天津在財政困窘的狀態下為了發展大無縫累積了高額債務，年年都在還債（作者訪談，2012/10/22）。據說原來甚至規劃把天鋼併給上海寶鋼，是張立昌堅持不妥協此事才作罷（作者訪談，2011/09/26-2）。

綜上所述，1978 年後政治動盪的結束，對於當時期的天津領導而言，城市在發展經濟的條件顯然並不特別突出（張弘遠、林雅鈴 2011, 45）；追求經濟增長既非中央對於天津的優先要求，亦非天津而言當下最迫切的任務。準此，在城市初始條件的限制下，筆者認為社會維穩將取代經濟成長，成為天津城市領導基於政績機會主義下施政的核心目標。這也意味盡力降低經濟改革對於城市居民、國有職工所可能造成的陣痛與影響。因此天津地方政府在 1978 年後更可能以超穩定機器而非成長機器的姿態而存在。這使得城市的經濟重建工程，是基於如何減少轉軌陣痛思維下設計的，一種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工程，政府提出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更多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1984 年經濟技術開發區選址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挑選了遠離市中心區數十公里的鹽鹼地，城市外環線以外設計了 500 米的綠化帶，禁止進行任何開發工作；開發區內包括生活區的規劃，都刻意強調中外分隔，此舉一方面避免外資進入衝擊城市自身的經濟體制與管理系統，同時憂心外資帶入一些不好的文化成分干擾原有民風風俗（作者訪談，2012/10/26-2；邱紅豔 2004, 85-88）。一位受訪者強調：對天津而言，「穩定是第一，發展是第二」（作者訪談，2011/09/29；作者訪談，2011/10/12）。最重要是攘衛京畿，經濟可以發展不好，但一定要穩定（王信賢 2014, 47）。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及：「天津是不出事，保安全就好。天津，天子之津，保衛首都。傳統任務是不出事就好。發展慢點也無所謂……上海不好，中央會急。天津正常，中央不會埋怨」（作者訪談，2011/10/24）。

許多對於天津經濟地位下滑的研究，都歸因於毗鄰首都「只求穩定即可」的發展思維，同時將天津經濟發展滯後的原因歸咎於領導型態，實際上這樣的思維仍必須觀照兩個比較凸顯的問題，其一：天津在 1980 年代選擇的求穩路線已經有了部分的研究成果（Cheung 1998, 18; Hans 1999, 183-210），天津為何選擇這樣的發展策略答案卻是眾說紛紜；本文認為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出現來自初始條件的限制與領導人基於政績機會主義的主觀抉擇，這也凸顯出中央政府對於全國總體雖然不乏整體的擘畫與籌謀，對於特定地域也有其要求或者鼓勵，但整體而言並不排斥地方經驗的出現，亦即鼓勵不同省級政府嘗試不同的發展途徑。因此發展途徑的選擇，是透過不斷的互動，找到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一位受訪者強調，「治安也很好，天津，地方領導人也是有分的，不是一定以 GDP 衡量，可能仍以不同地區有不同考量，對領導人特質的批判、標準也不同」（作者訪談，2011/09/28-2）。

對於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出現，故而不能忽略地方政府自己的主觀抉擇，一位受訪者認為「京畿之地，穩妥是比較好的選擇」（作者訪談，2011/09/29-2）。城市建設、物價工作既是李瑞環的強項（作者訪談，2011/09/26-2），他自己也強調：「再比如，我們主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照此下去，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這顯示以低物價確保群眾情緒穩定、社會局面穩定的所謂民心工程，除了城市初始條件外，更是天津領導在自主策略選擇下的政績亮點。^④

註④ 物價穩定應該作為天津的成績，而非問題（李瑞環 2013, 114）。「他不是想把它變成經濟明星。但是天津物價很穩定，所以大家都說要看社會主義去看天津」（作者訪談，2011/10/17）。

其次，求穩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對比於 GDP 以及財政上解可作為經濟表現的客觀指標，天津領導層如何以所謂的求穩凸顯出天津的特殊性，並未得到足夠的研究。筆者認為，超穩定機器追求的改革策略是一種漸進式、降低經濟改革震盪風險的一種經濟發展策略，以低物價及低失業率為施政標的；行政官僚持續透過行政指令方式干預市場運作，國有企業的存續高度倚賴政府的投入與支援。同時，1980 年代天津市政府擘畫的超穩定方針，雖是基於城市初始條件與政績機會主義下地方領導的主觀抉擇，卻由於菁英集團的支持以及行為者理性的成本效益評估下，^⑮進一步影響了之後 30 年天津政治爭辯的議題以及任何經濟變革可能出現的選項，亦即形成了歷史制度主義中的路徑依賴現象 (Peters 2012, 72)。

肆、天津 1980 年代確立的經濟方略：重視社會治安與低物價、低失業率的政策目標

天津在 1980 年代選擇了一條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漸進式的經改模式。^⑯因此與改革開放初期，多數地方政府唯經濟是從的發展模式相當不同，社會治安及社會穩定成為天津市委市政府在 1980-1990 年代的兩條工作重點，幾位受訪者提到，「天津是老工業城市，低工資、低物價，是領導刻意的結果」(作者訪談，2011/09/29、2012/10/26-2)。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及，「包括治安，天津還是亮點。管理還算可以，沒有不安感。社會秩序還是保持住了，抑制住了那些不好」(作者訪談，2011/10/18)。這使得天津在 90 年代後，一度是全中國最二低的城市，犯罪率最低、物價指數最低 (訪談紀錄，2011/10/10)。

每年國家統計局的社會治安綜合指數綜合評定，天津都是全國社會治安最好地區之一 (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7)。^⑰多數的沿海省市雖然在經濟效益、社會結構、人口素質都居於前列，但社會秩序往往居於後段 (朱慶芳 2008)。天津的社

註 ⑮ 關於制度再生產或者鎖進的機制可以參見 Mahoney (2000)。

註 ⑯ 據說持反對意見者，有的後來自請調離，有的則乾脆在北京長期「養病」(作者訪談，2011/09/30)。

註 ⑰ 天津在 1990 年代的治安工作表現上仍然突出，早於 1991 年底中共中央制定《關於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的規定(試行)》，1991 年 3 月，天津市委已要求各地區、單位與部門必須研擬建立綜合治理目標管理責任制，將綜合治理的任務、要求分解為若干具體目標，制定出具體落實措施，實行嚴格的考核獎勵制度，將目標管理與責任人的政治榮譽、政績考核、職級晉升與經濟利益掛勾，與評選先進單位、企業晉級掛勾，實行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制。(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編 1996, 173-174)。在天津市第八個、第九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中，均針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提出具體要求目標(天津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 2001, 55)。1992 年至 1995 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對全國各地區的社會發展水準進行了 4 次綜合評價，在社會治安方面，與其他沿海城市在社會治安方面形勢漸趨嚴峻迥然有別，天津市 3 次排名全國第一。甚至從 1997 年開始，連續八年蟬聯各省市社會治安指數之首(周路 1998, 12; 趙榮星、吳金星、李長凱 2005; 劉健、吳金星、李長凱 2005; 武長順 2011)。

會秩序與社會穩定卻向來爲人所稱道，1987年十三大前夕鄧小平視察天津，對於天津的社會局勢穩定，給予了李瑞環相當的肯定。^⑧地方領導如何透過經濟表現以外的數字展現地方亮點與個人政績，在天津體現更明顯（作者訪談，2012/10/30）。李瑞環（2013, 114）自己更強調，「天津把物價穩到今天這種程度，特別是目前一些省市出現較大波動的情況下，我們能保持基本穩定，這是很不簡單、很不容易的，這應該說是天津的成績、而不能當成問題」。

當時的市委書記李瑞環認爲對於牽一髮會動全身的問題都應深思熟慮，「不應該使群眾中出現任何擔心漲價的情緒，如果只考慮個別和局部的利益，造成整個社會的人心不穩，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就會受到損害。」同時他認爲，「物價問題實質上是個政治問題……就目前來講，物價問題已不簡單是價格的漲落、調哪種物價的問題，涉及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和群眾的利益問題。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群眾問題、社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必須把價格、工資問題放到全域的位置上，從政治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就物價論物價是看不清、說不清、處理不好的」（李瑞環 2013, 110）。因此，「天津對物價的控制比較堅決，一些部門和單位想漲價的勁頭非常之大，並有許多理由，我們還是不准亂漲價。」（李瑞環 2010, 356）他承認，就發展商品經濟的角度上說，只講穩定物價並不科學，但如果不確保物價穩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難以推進的（李瑞環 2013, 112）。更重要的是，若物價上漲幅度過快，將造成社會心理上難以承受的地步，而這樣對於社會穩定的局面是不利的（李瑞環 2010, 603-604）。

中國大陸出現第一次的價格闖關源於 1988 年，中共中央決定逐步取消價格雙軌制，但在群眾預期物價會大幅上漲的心理下，引發搶購風潮，該年的物價改革以失敗告終。隨後中共當局開展治理整頓，透過經濟收縮壓制通貨膨脹，爲價格改革創造良好條件。事實上，有部分城市更早於全國之前率先實行價格改革，以廣東爲例，1979 年，塘魚價格放開，1981 年，率先解決火柴價格不合理的問題，1984 年，全面放開蔬菜價格（苕子 1987, 4）。一般而言，截至 1993 年，市場調節價在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已占到 93.8%。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中，90%也已放開，除糧、油、棉等國家宏觀控制的少數重要商品外，所有副食品取消計畫內和計畫外的價格雙軌制，全部實行市場價格（楊繼繩 1993, 19；2009, 20-22）。

但天津市在實際中執行的經濟發展戰略仍是「物價越低越好」（作者訪談，2011/09/29），「物價必須能穩住，群眾不願意辦的事情就該緩辦或不辦」（李瑞環 2013, 113）。爲維持低價，1987 年 3 月，對鮮蛋、蔬菜、水產品和奶品等行業實行產銷一體化，以加強鮮活商品在市內的產銷調節和統一調度。並對企業進行鉅額的財政補貼。以 1980 年爲例，補貼數額相當該年財政收入的 8.9%，財政支出的 25.2%，1984 年的補貼金額同比 1980 年增長 54.97%，1985 年同比 1984 年又增長 55.28%，其中該年的補貼金額中央承擔部分爲 6.9%，地方財政承擔 93.1%（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

註⑧ 據說大陸有句民間俗諺，「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錢少，不到天津不知道社會主義好」。

1996, 393)。1988 年補貼金額占財政支出達 57.7%，1990 年補貼金額已攀升至占該年財政支出的 71.7%。^⑩李瑞環自己也提及：「在物價改革出臺以來，我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補貼七元五角，每年達兩億多元，原來對農村和商業的補貼也基本沒減，國家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如再增加過多的補貼，國家財力就負擔不起。」（李瑞環 2013, 111）

當時企業按補貼津貼多寡決定生產數量，商店惜售，造成居民搶購。爲了防止物資外流，天津退回票證時代，重要民生物品憑證供應（楊繼繩 1988, 5-7）。利用大量的財政津貼維持產品的低價狀態，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⑪物價政策成爲 1980 年代天津領導最引以爲傲的政績之一。例如李瑞環強調，「在穩定物價方面，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第一，市委、市政府始終把物價擺在重要位置……第二，特別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想方設法穩住……對天津採取穩定物價的方針，大多數人是擁護的，但也有不同的意見，認爲這樣作不符合改革的思想，不能理順價格體系，建議天津也要像外地那樣不要管得太死，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把價格更大範圍地放開……但從實際出發，這種理論實現起來是很難的。現在大多數人對物價問題比較敏感……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看理論物價的合理性，還要從政治上去看，從總體上去看，從人民群眾情緒上去看……當前對物價仍然要繼續堅持穩定的方針。」（李瑞環 2013, 114）

低失業率是另一項 1980 年代天津市政府所重視的施政指標，李瑞環強調：「我們一直把看病、上學、住房、工作由國家負責作爲社會主義優越性加以宣揚，而實際上，在原有體制下國家負責，就是企事業單位負責。放開搞活之後，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一旦搞得不好甚至垮掉，那裡的職工由誰負責呢？」（李瑞環 2013, 108）因此在其所擘畫的經改藍圖，必須以不犧牲職工利益爲基礎，「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職工，把青春和汗水獻給了國家建設……對於他們來講，幹活給錢，看病給報銷，退休了給養老金，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是他們的應得利益。現在他們的生活困難是經濟轉軌造成的，並非他們不努力勞動，黨和政府理應予以特別的關注和照顧。」（李瑞環 2013, 107）如果多餘勞動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與紓解，沒有基本的生存條件，就會造成社會不穩。「不能使群眾感到『危機感』，真要是造成一隻失業大軍怎麼得了，必須『先挖渠後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減人，哪個廠裁下人來，哪個廠就必須就地消化掉」（李瑞環 2013, 94）。企業家講成本講管理，但社會主義的廠長、經理都是共產黨員與黨的幹部，職工有困難找領導，代表黨有威信，企業改革不管快或慢，都要優先考慮職工吃飯問題（李瑞環 2013, 107）。

註⑩ 一般而言，價格補貼支出占同期財政支出 40%政府財政便易陷入危機，參見王軍（1991, 26）。相關補貼金額比例則見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1996, 391-393）。

註⑪ 天津物價總的是平穩的，相對也是低的，這是天津社會局面得以穩定的原因，參見李瑞環（2013, 112）；楊繼繩 1988 年爲文批評天津的物價補貼政策，參見楊繼繩（1988, 5-7），另參見范銀懷（1983, 12）。天津在當時物價控制的表現上確實十分出色，不僅是直轄市之首，甚至優於全國平均水準。

國企比重高，快速改革國企的穩定成本高，這使得天津在開展國企改革工作時必須相對謹慎，一位受訪者強調：「上海做國企改革比天津更早。天津變得比較晚……。應對比較緩慢，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改變……分流太晚了」（作者訪談，2012/10/26）。

一位受訪者提及，「96年市場經濟開始，我爺爺到天津，到火車站，前面還是一堆國營旅館、國營飯店，都還是有很強國有經濟味道」（作者訪談，2012/10/21）。

物價補貼一方面達到了維持物價穩定、保障民生正常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同時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忽視，包括鼓勵消費抑制生產、以政策性虧損掩飾企業經營性虧損、扭曲商品真實比價、倒買倒賣所導致社會分配的不公。但更嚴峻的問題還在於價格補貼為政府所帶來的巨大財政負擔往往必須由地方政府承擔。天津市政府要求企業壓低售價、政府則以政府指令提供貸款與包銷所有產品。為了降低失業率所可能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政府要求盈利企業與破產企業間進行合併以擴大規模，卻可能連帶影響前者的經營體質。企業間進行無償調撥財產，產能不斷擴大，^①成為天津 1990 年代經濟再造時必須面對的困難與挑戰。^②

伍、制度存續階段與路徑依賴：天津 1990 年代的經濟方略

1990 年代初當聶璧初任職市長時期曾嘗試對天津低物價與低失業率的經改策略進行改弦易轍，^③聶璧初認為：

「天津應以成為北方金融與商業中心為目標，並利用既有工業基礎，提高工業檔次……。天津國企的產品質量不行、管理體制不行、冗員太多；因此企業要能自主經營，同時還要大量的跟外商合作。」即使如此，此時期對於經濟改革的工作仍然無法確保執行的強度（作者訪談，2012/10/26），在菁英集團的支持下，^④1980 年代的制度遺產持續發揮作用，物價調控與降低失業率仍然是 1990 年代整個天津市政府的工作重

註① 當時對市場的預估是認為市場會繼續擴大（作者訪談，2011/09/28）。

註② 一位受訪者提及，過去低物價與領導思路有關，跟他意識形態有關，覺得高物價不利人民生活，但物價低就很難成為經濟城市，另一位也提到，大陸城市地方亮點跟首長有關，特別在天津體現更強，天津領導本身理念重視民生，不能物價上漲，天津有名就是低物價、低犯罪率，但也造成天津經濟的問題（作者訪談，2012/10/30、2012/11/05）。

註③ 此時天津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已經與 1980 年代大相逕庭，整個 1980 年代天津之所以能選擇採取漸進式的經濟增長策略，與其國企在全國中仍保有一定經濟地位有關。直到中共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許多沿海城市順勢崛起後，天津高層已經感覺到危機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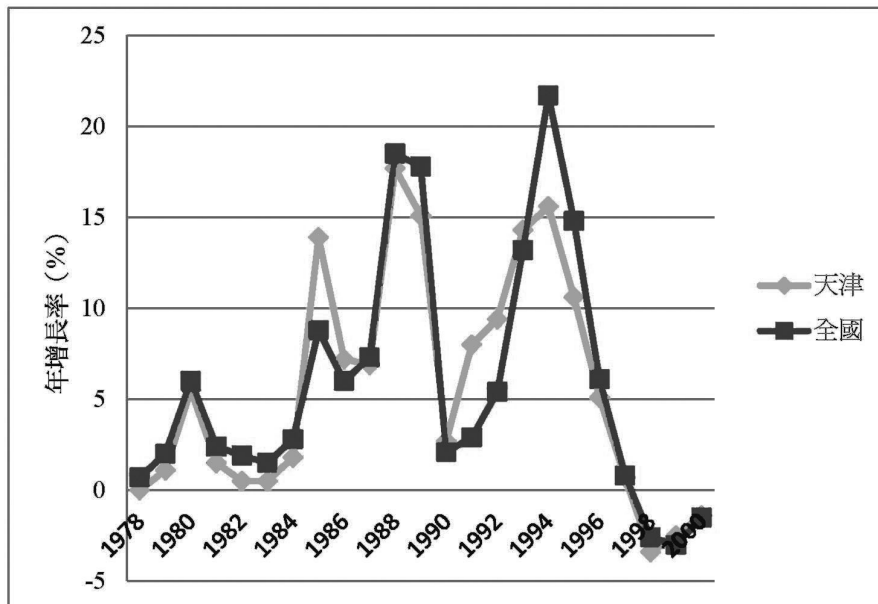
註④ 天津在 1990 年代持續走向維穩方針，一方面是李瑞環透過調控物價等民心工程，在百姓間官聲極高，以政治局委員之職，對於天津仍有極高影響力。它方面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主要是 89 民運後），天津局勢能夠穩定對北京是較為理想的，這使得天津的政策不能過度冒進（作者訪談，2011/09/29）。

心，特別是對於物價的控制幾乎成了不可逆轉的政策選項（Peters, Pierre and King 2005, 1287-1288）。

舉例來說，1991 年天津市曾一度放開包括雞蛋在內的農副產品收購與銷售價格，進入全面市場調節狀態。進入 1992 年後重新收緊物價政策，每堅持降低物價指數一個百分點，背後都是 1~2 億的支出。1995 年，在全國價格全面放開的大環境下，天津成立專門的雞蛋調市工作組，重新實行價格管制。工作組成員包括四位市長、兩位祕書長、農委、商委主任物價局、財政局、工商局、公安局及交通局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同時各委、局及縣、鄉也由專人負責或成立相應的辦公室。層次之多、人員之眾、規模之大、重視程度之高，均為少有（陳宗勝 1997, 70-71）。工作組必須每天向市主要領導報告當日的鮮蛋調市量，完成日調市任務的比例，以及未完成任務的原因，還需製作各種統計報表，工作至細至微。

1993 年針對物價居高不下、部分國有企業轉軌困難等問題，天津市政府提出狠抓物價、解困和扶貧三個指導方針。天津的物價在全國大中城市中持續處於較低水平，以 1996 年為例，全年商品零售價格漲幅為 5.1%，還比 1995 年回落 5.5 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天津的全年商品零售價格一般均低於或者與全國平均水準相當（見圖 2），對於物價的控制則居直轄市之首（見圖 3）。^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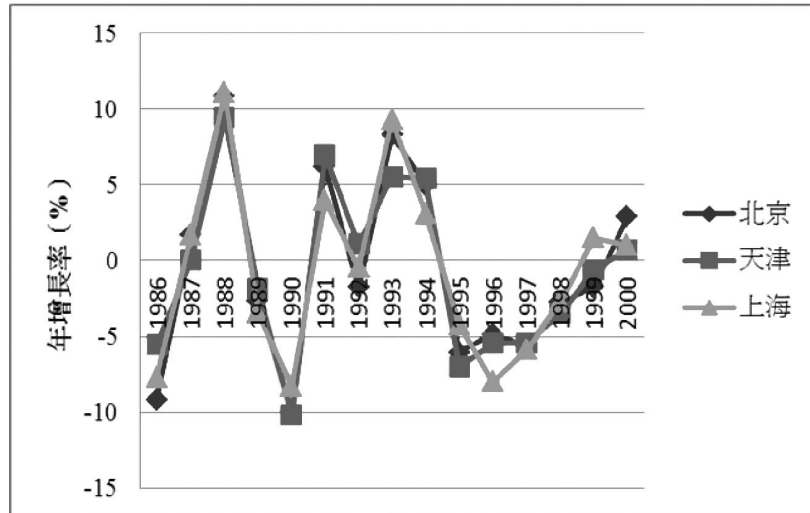
圖 2 天津全國零售商品價格比較



資料來源：天津市統計局（1999），筆者自行計算。

註⑤ 圖 2、圖 3 中天津與北京、上海雖然看似差距不大，但為了維持這 1、2 個百分點的差距，背後天津市政府需支付上億的支出，以維持通膨率增長基本控制在 2% 以內，也能比其他直轄市甚至是全國平均水準更低。

圖 3 通膨率增幅比較



資料來源：天津市統計局（1999），筆者自行計算。

顧及企業倒閉及職工失業問題，即使在面臨虧損狀況下，國有資產亦不敢輕易撤離特定產業，勉力維持虧損企業的經營或者透過嫁接改造方式進行企業合併（作者訪談，2011/09/26-2）。支柱產業只能不斷累積不能刪減，表 3 提供了天津自六五計畫時期之後歷次的五年計劃支柱產業清單，從六五時期單列輕紡工業作為支柱產業開始，隨後支柱產業數目不斷累積（作者訪談，2011/09/26），工業門類齊全但平行鬆散，面面俱到的產業選擇造成城市的優勢難以凸顯。^⑧

表 3 天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六五計畫	輕紡工業
七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電子、石化、消費品
八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裝備、電子、石化
九五計畫	汽車及機械裝備、電子、石化、冶金
十五計畫	信息、汽車、商貿物流、金融、房地產
十一五規劃	電子信息、石油和海洋化工、汽車和裝備製造、石油鋼管和優質鋼材、生物技術與現代醫藥、新型能源和新型材料
十二五規劃	航天航空、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國防科技、輕工紡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註⑧ 工業門類齊全但平行鬆散是改革開放初期，多數省市都面臨的問題，但與其他沿海城市相比較，天津在包括城市建設、經濟設備等建設欠債上矛盾相對嚴重，特別與其作為直轄市的地位不相適應；其次，與其他沿海大城市比較，天津的骨幹帶頭企業之少、許多工業門類形不成優勢和系列，也成爲一大弱點。參見蔡孝箴、王鴻江、吳敬華（1982, 21）及作者訪談，2011/09/26。

綜上所述，相對於其他沿海城市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歷一定程度市場力量的洗禮。天津所採取的經濟運作方式顯得更為漸進與更為保守，在整體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動下顯得不相協調。首先，天津本身是一個生產能力強但資源相對貧瘠的城市，工業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原材料、燃料、動力 80% 幾乎都需依賴外埠供給。^⑦ 進入市場經濟後，材料供應改為市場購買，工業利潤大量轉移。市政府雖盡力調控天津一地的物價穩定，但定價市場化是一個全國性且幾近難以逆轉的趨勢，容易造成天津國有企業面對材料來源上的難題。其次，行政指令計畫生產易於造成產能的無限擴張，但設備老舊下造成企業競爭力衰退，^⑧ 包括大量輕工業產品形成過度供給，市屬採購供應站統購統銷的做法，開始難以為繼，陷入企業負擔加重，必須要求政府補貼的惡性循環中。

圖 4 勾勒出了整個 1990 年代天津國有工業生產企業的財務狀況，相對於北京及上海，天津的股東權益比率偏低，意味著天津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負債較高，基本財務狀況不佳，一方面收益需用以支付大量利息，他方面當營收狀況不良時將容易產生週轉問題。圖 5 的資本負債率印證了上述的說法，由於天津地方國企長期償債能力較弱，公司只能通過增加融資的途徑降低負債率。資本負債比例為 200% 時是一般警戒線，但天津國企在整個 1990 年代的表現水準都高於這個數字，顯示企業資不抵債狀況嚴重。舉例來說，無縫鋼管做為天津 1990 年代後最引以為傲的成績之一，幾乎完全倚賴天津自身舉債建設。^⑨ 1996 年正式投產後天津鋼管公司（以下簡稱天鋼）即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需歸還大額銀行利息，它方面必須為新增的固定資產提取折舊，每年虧損達數億元。自 1980 年代開始，作為市屬的國有獨資企業，專責投資與金融服務的天津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為支援天鋼累積了大量外債（李樹鋒 2001），此種營利企業對於虧損企業的資金挹注在當時並不罕見。^⑩ 即使如此，天津當局對於國企職工的大量下崗仍盡力延遲至 98、99 年，一位受訪者提及，「國企改革、下崗，天津是全國受影響很突出的地方，受衝擊很大……不能說改革全把它處理掉，措施相對比較緩慢一點……職工比較多，要給它提供福利，傳統之前有的東西。」（作者訪談，2011/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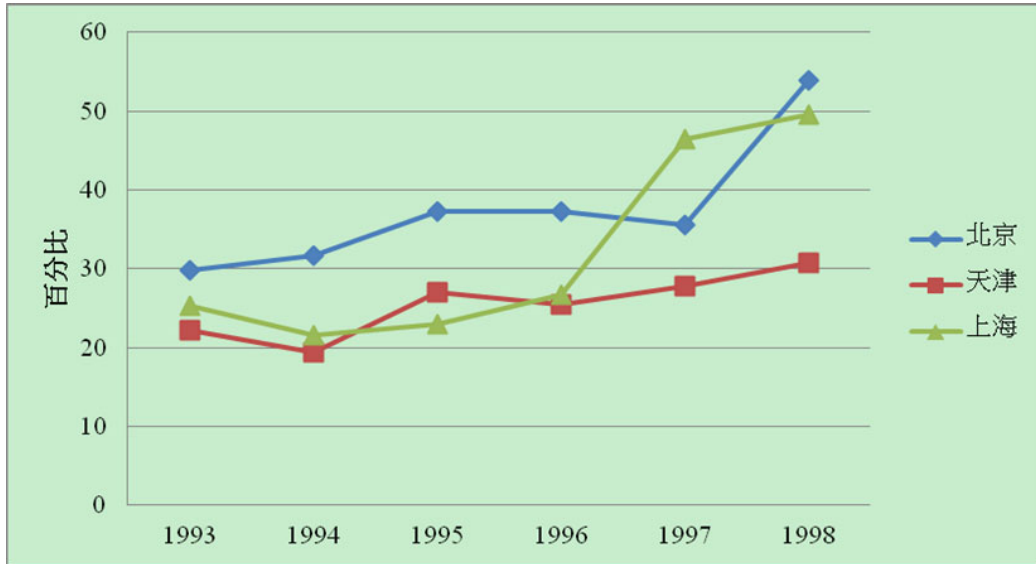
註 ⑦ 上海自配比重可達 80~90%。

註 ⑧ 天津企業設備 1970、80 年代購入的僅占 10%，65% 是 1950 及 60 年代購入的，還有約 25% 是 40 年代購入的，參見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1992, 23）及馬獻林（1998, 4）。

註 ⑨ 1980 年代天津在進行大規模城市建設時已經累積了相當的負債，訪談者提及幾乎必須以部分企業倒閉為代價把城市建設做起來（作者訪談 2011/09/28）；後續許多大型工業項目的動工都是天津自己貸款啓動，尤其是以大無縫為代表的冶金工程，因此債務問題一直是天津的軟肋（作者訪談，2011/09/30、2012/10/21、2012/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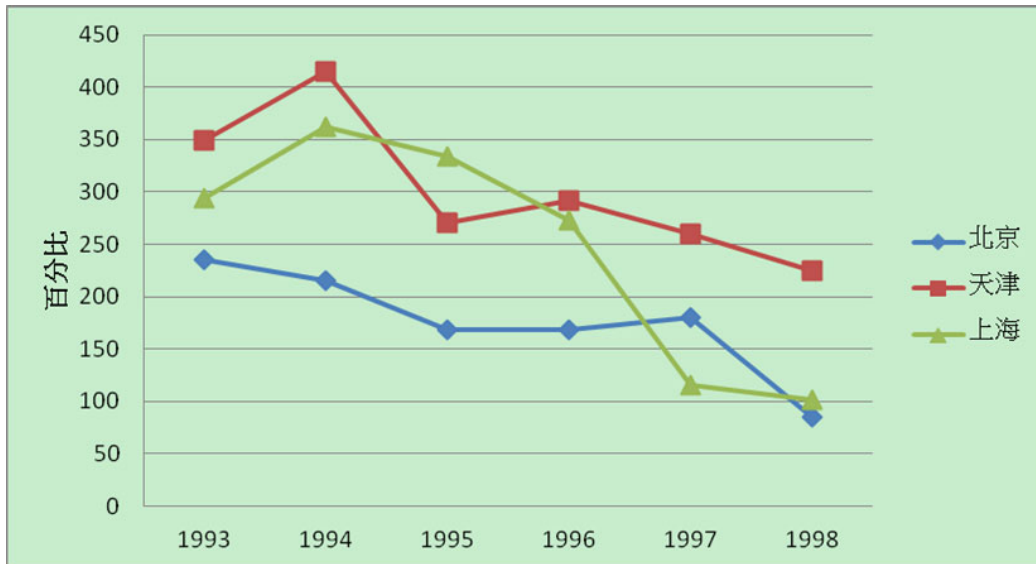
註 ⑩ 這也是多數省市都面臨的問題，但對於缺乏骨幹帶頭企業及經濟設備建設欠債相對嚴重的天津而言，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或將更為巨大，參見作者訪談，2011/09/28。

圖 4 各地區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股東權益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3~1998），筆者自行計算。

圖 5 各地區國有工業生產企業資本負債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3~1998），筆者自行計算。

與此同時，濱海新區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與區域封閉性，與天津其他區縣呈現各自相對獨立、封閉運行的社會管理、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運營系統（作者訪談，2011/09/26、2011/10/12、2012/10/24），這種獨立的結構特徵，反映出經濟特區作為飛地在區域層面上的一種經濟孤島效應（楊東峰、熊國平、王靜

文 2007, 27)。也顯示出即使不斷地突出強調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天津在這塊領域實際上相當謹慎（作者訪談，2011/09/26）。

制度理論往往被視為用於解釋政策停滯的強有力工具，特別是歷史制度論中對於時序的強調，突出前一段歷史條件對下一段制度變遷所可能產生出的制約作用，使得路徑依賴因此可用於解釋天津超穩定機器在 1980-1990 年代的延續性（Knutsen 2012, 166）。1980 年代的天津領導在城市初始條件與政績機會主義考量下選擇了超穩定機器的城市發展模式，1990 年代天津領導選擇的經濟方略，首先是李瑞環之後的領導人，並不具備可堪比擬的民望與影響力，同時李瑞環在 1990 年代後對於天津的發展仍然持續扮演關鍵角色（作者訪談，2011/09/29）。另一方面，天津的物價工程以及城市建設當時確實成為天津獨樹一幟的特色成績，地方領導難以輕言放棄長期以來基於低物價、低失業率經濟政策運作下所獲得的政治利得，^①將天津建設成為經濟明星自始至終並非優先目標（作者訪談，2011/10/17），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1980 年代犧牲產能升級與設備汰換的可能性，為配合政府城建工程上解了大量資金；又因政府調控物價與減少失業之要求，一方面需遵照行政指令生產，他方面還需配合嫁接改造工程，又進一步加深對政府的依賴，^②此時期的天津進入舊制度下的遺產與延續時期。

根據以上論述，亦可合理說明何種「重大關鍵」影響 2000 年後天津濱海新區等之發展，本文認為在黨國體制下，區域發展原來就離不開政治邏輯，^③2002 年後戴相龍調入天津擔任市長，2005 年後天津濱海新區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央思維的變化導致權力集團組成內部及領導型態發生變化，此一關鍵事件也使得長期選擇超穩定機器發展模式的天津，在 21 世紀進行改革開放工作，並且在 2006 年啟動濱海新區與一連串招商引資行為（天津超穩定機器的发展時序演進，參見表 4）。^④

註 ① 關於路徑依賴中的報酬遞增與自我強化，可以參見 Pierson (2004)；另一方面，除了考量到轉換路徑的成本外，制度本身不只可能作為限制而存在，同時也可能是資源：能夠多少的滿足行為者的需求，為行為者的利益而服務，成為關注制度存續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參見 Hall and Thelen (2009, 11-14)。

註 ② 也加強對政府依賴的正當性（作者訪談，2012/10/21、2011/09/26-2）。

註 ③ 「所以看天津，不能從天津看天津，要從中國改革戰略來看天津，特別是北方城市發展，受政治因素發展非常重」（作者訪談，2011/10/14）。

註 ④ 對比於東部沿海包括深圳特區及浦東新區均成功扮演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聯結的角色，成為帶動珠三角及長三角區域發展的火車頭，隨著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發展的飽和，環渤海卻缺乏此一對外聯結的火車頭，天津濱海新區正是在此戰略下出現（王信賢 2014, 34）。原中央銀行行長戴相龍出任天津市長，被認為具有平衡地方實力的意涵（張弘遠 2011, 46），隨後中央開始向天津投入大量國家項目，一位受訪者提及，「在中國體制還是一種授權，中央希望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變化，先是有個想法，才給地方這樣的權力。在新區、開發區建設最明顯」。（作者訪談，2011/10/12）天津市的角色浮上檯面，與政治菁英或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幾位受訪者都強調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角色至為關鍵，當然普遍的說法則是，這屆政府也需要出成績，因此這肯定也不是誰一個人能作決定（作者訪談，2011/09/28-2、2011/10/18、2011/10/10、2012/10/21）。

表 4 天津超穩定機器的路徑依賴

影響天津發展的關鍵時刻	1980年代
路徑依賴階段	1980~1990年代
制度遺產：超穩定機器的發展模式	強調社會維穩甚於經濟成長、對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調控成爲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
維續機制	1. 特定領導離任後對於天津發展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 地方領導難以輕言放棄長期以來基於低物價、低失業率經濟政策運作下所獲得的政治利得
影響天津發展的關鍵時刻（轉折點）	中央思維轉變 2002年戴相龍調入天津 2005年後天津濱海新區正式納入中國國家整體發展戰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 論

筆者在本文初始，檢視成長機器模式能否適用於解釋天津的發展模式解釋，但在天津所呈現的狀況卻是，地方政府重視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甚於推進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調控成爲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這顯示，「成長機器聯盟」模式本身並不足以解釋中國大陸不同城市的相異發展軌跡，改革開放時期。在考量經濟穩定即是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天津市領導不願輕啓物價改革等經濟舉措，擔心由於市場力量的進入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選擇了社會民生工程做爲發展的政績標的。雖然使得物價無法反映真實的供需狀況，盈利企業與虧損企業間的嫁接改造也衝擊了前者的經營體質，但在當時取得了重要的民生實績。準此，天津的發展模式呈現的是所謂超穩定機器的發展模式。政府壟斷資源分配，抵制市場力量以及外國秩序的干擾，追求穩定至上的發展模式而非推進城市經濟增長的推進器角色。

超穩定機器的出現不可忽視的在於，1980 年代天津經濟發展條件的弱勢以及政治菁英的晉升動機，單純將問題歸咎於特定領導之意識形態甚至是施政能力的良窳並不是故事的全部。以往認爲天津經濟地位的隕落始於 1990 年代，然而當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延續自 1980 年代的施政方針，亦即天津 1980~1990 年代的城市治理經驗，充滿路徑依賴的痕跡。本文認爲，天津個案可以與成長機器、發展型國家甚至是企業家型國家等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理論框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一直到 2002 年後外來幹部赴任以前，成長機器中所強調的以追求經濟成長爲導向、公部門基於謀求利潤的動機，與私部門結合驅動城市成長機器以獲取房地產交換價值和促進城市發展，都無法完整用於解釋天津的發展路徑。中國實在太大了，各地的發展差距之大遠高於其他世界相同規模的其他國家，其中 23 個省份，是最實質的改革實體，而所謂「中國模式」則是不具體的概念。^⑤

註⑤ 蔡文軒（2011, 208）。

過去多數針對中國大陸城市政治學的研究相當多的重心被置放在珠三角及長三角地帶，實則無論是北方地區、內陸地帶，甚至是東北省份，這些省域有著與珠三角及長三角截然不同的發展經驗，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舉例而言，不同於其他省市在 1990 年代末期，出於中央政府的調控與引導，才開始延伸出對社會公平議題的關注。天津在 1978 年後選擇的是一條先維穩，再成長的道路，這是與其他沿海城市相當不同的發展策略。中國大陸並不存在單一整合的城市體系，也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城市能代表整個國家，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經驗過於特殊以至於不可能通則化所有的中國城市發展經驗 (Chung 1999, 3)。這也是為何必須豐富華北或者內陸城市經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進一步探索近代中國大陸更多元且殊異的都市化表現。

兩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可以進一步觀察，當天津濱海新區進入國家戰略階段，原來的天津超穩定機器在轉型成為成長機器的過程中，面對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生態，地方政府行為的轉化值得觀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即強調未來中國大陸將不再以經濟成長速度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同樣值得關注。

* * *

(收件：104 年 9 月 3 日，接受 105 年 5 月 2 日)

附錄：受訪者編號

編號	受訪者	訪談日期
26092011	天津師範大學教授	2011/09/26
260920112	天津市經濟發展研究所前研究員	2011/09/26
27092011	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座談會	2011/09/27
2809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09/28
28092011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09/28
2909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09/29
290920112	天津師範大學教授	2011/09/29
3009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09/30
1010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10/10
1210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10/12
1410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10/14
1710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10/17
18102011	天津市政府官員	2011/10/18
24102011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1/10/24
21102012	天津商業大學教授	2012/10/21
22102012	天津市經濟發展研究所前研究員	2012/10/22
22102012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0/22
24102012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0/24
2610201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0/26
26102012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0/26
3010201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0/30
05112012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	2012/11/05
07112012	地產公司代表	2012/11/07

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of Top Priority: A Pro-Stability Machine in Tianjin

Rung-Yi Chen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pattern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Tianjin as a specific case. Existing literature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been made predominantly on the basis of the “growth machine” model, which takes the growth of cities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 among some internal urban-based players for pecuniary gains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Yet, I argue that to directly apply the growth machine model to explain situations in a socialist society, such as China, may not lead to precise assessment.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the gap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pays scant attention to the urban renewal experience in Tianjin as a tradition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center in north China. This paper, therefore, will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will shed light o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n Tianjin that is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al catch-up of the city. Second, it will offer a fresh insight into the debates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Pro-stability Machine, Growth Machine, Tianjin, Path Dependence

參考文獻

- 上海財政稅務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上海財政稅制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45/node57355/node57357/node57359/
 userobject1ai44257.html](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45/node57355/node57357/node57359/userobject1ai44257.html)，查閱時間：2016/2/2。Editorial Board of Financial and
 Taxation Yearbook of Shanghai. 1995. “Shanghai caizheng shuizhi zhi” [Financial and
 Taxation Yearbook of Shanghai]. (Accessed on January 02, 2016).
- 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編，1996，《中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年鑑》，北
 京：法律出版社。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1996. *Zhongguo shehui zhian zonghe zhili nianjia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Chinese Public Security Yearbook*]. Beijing: Law Press China.
- 中國財政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93~1998，《中國財政年鑑》，北京：中國財政雜誌社。
 Editorial Board of Financial Yearbook of China. 1993~1998. *Zhongguo caizheng nianjian*.
 [*Financial Yearbook of China*].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Magazine Press.
- 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1992，〈天津老工業基地的改造與振興〉，《經濟研究參考》，
 Z5：23-27。Research Office of Tianji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1992. “Tianjin
 laogongye jidi de gaizao yu zhenxing”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hrinking
 Industrial Cities in China: the Case of Tianjin].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Z5: 23-27.
-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1996，《天津通志·財稅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Tianjin Municipal Editorial Board of Local Chronicies. *Tianjin tongzhi caishuizhi*
 [*Overall Annuals of Tianjin: Finance and Taxation Volume*]. Tianjin: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
- 天津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2001，〈天津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10 年回
 顧〉，《天津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54-58。Commission Office of Tianjin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2001. “Tianjin shi shehui zhian
 zonghe zhili shi nian huigu”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in
 Tianjin: 1991~2001]. *Journal of Tianj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2: 54-58.
- 天津市統計局，1999，《天津五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Tianjin Municipal
 Statistical Bureau. 1999. *Tianjin wu shi nian*. [*Tianjin Fifty Years*].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王信賢、涂秀玲，2014，〈多層次競爭：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中國大陸
 研究》，57（1）：34-61。Wang, Hsin-hsien and Hsiu-ling Tu. 2014. “Duo cengci
 jingzheng tianjin binhai xinqu de fazhan yu tiaozhan” [Multi-Level Competi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7
 (1): 33-61.
- 王軍，1991，〈價格補貼：處境與出路〉，《理論學刊》，2：26-28。Wang, Jun. 1991.

- “Jiage butie chujing yu chulu”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Subsidies Measures]. *Theory Journal* 2: 26-28.
- 王嘉州，2009，〈政治利益與資源分配：中國大陸各省政策影響力模型之建立與檢定〉，《遠景基金會季刊》，10 (1)：89-134。Wang, Chia-chou. 2009. “zhengzhi liyi yu ziyuan fenpei zhongguo dalu ge sheng zhengce yingxiang” [Political Interes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onstru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Models of the Provinces' Influence upon the Central Policy in China]. *Prospect Quarterly* 10 (1)：89-134.
- 王樹春、王常柏，2005，〈天津市所有制結構、企業組織的變遷及其趨勢〉，《環渤海經濟瞭望》，3：47-51。Wang, Shu-chun and Chang-bo Wang, “Tianjin shi suo youzhi jiegou qiye zuzhi de bianqian ji qi qushi”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Tianjin]. *Economic Outlook The Bohai Sea* 3: 47-51.
-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0，《北京志》，北京：北京出版社。Editorial Board of Almanac of Beijing. 2000. *Beijingshi difangzhi*. [Almanac of Beijing].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朱慶芳，2008，〈社會和諧指標體系綜合評價和分析 (1978~2006)〉，http://219.141.235.75/pws/zhuqingfang/grwj_zhuqingfang/P0200804023300_72658707.pdf 中國社會學網，查閱時間：2012/07/20。Zhu, Qingfang. 2008. “Shehui hexie zhibiao tixi zonghe pingjia han fenxi (1978~2006)” [Assessment of China's ‘Social Harmony’ Index System (1978~2006)]. (Accessed on July 20, 2012).
- 吳敬華，1991，〈九十年代天津經濟發展若干問題〉，《管理世界》，3：197-202。Wu, Jing-hua. 1991. “Jiu shi niandai tianjin jingji fazhan ruogan wenti” [Issues of Tianj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Management World* 3: 197-202.
- 宋杰主編，2004，《天津市十個五年計劃回顧 (1953~20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Song, Jie. 2004. *Tianjin shi shi ge wu nian jihua huigu (1953~2003)*. [Review of Ten Five-year-plans in Tianjin (1953-2003)].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李瑞環，2010，《務實求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i Ruihuan. 2010. *Wushi qiuli*. [Philosophy: An Art of Liv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李瑞環，2013，《看法與說法》，香港：中華書局。Li Rui-huan. 2013. *Kanfa yu shuofa*. [Views and Claims].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 李樹鋒，2001，〈天津國投難逃關閉厄運〉，《財經時報》，8月27日。Li, Shu-feng. 2001. “Tianjin guo tounan tao guanbi eyun” [State-owned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Tianjin Likely to Close Down]. *BUSINESSTIMES* (August 27).
- 杜廈，1986，〈論天津經濟發展的外向型戰略〉，《天津社會科學》，1：8-13。Du, xia. 1986. “Lun tianjin jingji fazhan de waixiang xing zhanlüe” [Tianjin's Outward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1: 8-13.
- 周路，1998，〈論天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機制〉，《理論與現代化》，1：12。Zhou, lu. 1998. “Lun tianjin shehui zhian zonghe zhili de jizhi” [Mechanisms of Tianjin's

-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1: 12.
- 武長順，2011，〈新時期天津公安工作科學發展的探索與實踐〉，《天津日報》，12月19日。Wu, Chang-shun. 2011. “Xin shiqi tianjin gongan gongzuo kexue fazhan de tansuo yu shijia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n Tianjin in the New Era]. *Tianjin Daily* (December 19).
- 邱紅豔，2004，〈超越結構－行為體的二元分析：1980~99年天津市政府投資政策及實踐分析〉，香港：城市大學公共與社會行政學系博士論文。Qiu, Hong-yan. 2004. “Chao yue ‘Jiegou--xingwei ti de eryuan fenxi: 1980~99 nian Tianjin Shi zhengfu touzi zhengce ji shijian fenxi’” [Beyond structure vs. agency: an analysis of local investment & implementation in Tianjin (1980~99)]. Hong Kong: Ph. 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姜承昊，1997，〈中國省際財政平衡和區域差距研究〉，《當代財經》，8：35-41。Jiang, Cheng-hao. 1997. “Zhongguo shengji caizheng pingheng han quyu chaju yanjiu” [Study on Provincial Fiscal Balance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China].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8：35-41.
- 苕子，1987，〈奇異的『黑箱』－物價揭密〉，《南風窗》，9：4-7。Zuo, Zhi. 1987. “Qiyi de heixiang wujia jiemi”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Prices]. *South Reviews Magazine* 9: 4-7.
- 范銀懷，1983，〈把三百萬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瞭望》，3：12-13。Fan, Yin-huai. 1983. “Ba san bai wan renmin de jiku fang zai xinshang” [The Tianjin Government Concerned of Citizen’s Sufferings]. *Outlook* 3: 12-13.
- 殷潔、張京祥、羅小龍，2006，〈轉型期的中國城市發展與地方政府企業化〉，《城市問題》，14：36-41。Yin, Jie, and Jing-xiang Zhang, Xiao-long Luo, “Zhuanxing qi de zhongguo chengshi fazhan yu difang zhengfu qiye hua” [Urban Develop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Entrepreneurialism in Transitional Era of China]. *Urban Problems* 14: 36-41.
- 馬獻林，1998，〈加快落實天津經濟發展的思路〉，《求知》，8：3-5。Ma, Xian-lin. 1998. “Jiakuai luoshi tianjin jingji fazhan de silu” [Speed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anjin]. *Seek Knowledge Monthly* 8: 3-5.
- 張弘遠、林雅鈴，2011，〈中國特區經濟發展誘因機制轉變的政經意涵：天津濱海新區的個案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4（2）：35-62。Zhang, Houg-yuan and Ya-ling Lin. 2011. “Zhongguo tequ jingji fazhan youyin jizhi zhuanbian de zheng jing yihan: tianjin binhai xinqu de gean fenxi”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hang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in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 Case Study of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4（2）：35-62.
- 陳宗勝，1997，〈價格管制復歸的制度變遷研究：天津市雞蛋價格管理剖析〉，《經濟研究》，11：69-80。Chen, Zong-sheng. 1997. “Jiage guanzhi fugui de zhidu bianqian

- yanjiu: tianjinshi jidan jiage guanli pouxi” [Analysis of Tianjin's Price Control Policy: the Case of Egg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69-80.
- 楊東峰、熊國平、王靜文，2007，〈沿海開發區一種典型深層結構：天津泰達為例－全球鏈接·區域獨立·自身極化〉，《城市規劃》，31（7）：25-31。Yang, Dong-feng, Guo-ping Xiong and Jing-wen Wang. 2007. “Yanhai kaifaqu yi zhong dianxing shengceng jiegou: tianjin taida weili quanqiu lianjie quyue duli zishen jihua” [Typic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oastal Development Zones: A Case Study Of Tianj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City Planning Review* 31（7）：25-31.
- 楊繼繩，1988，〈孤島的困窘－關於火柴價格的故事〉，《瞭望》，28：5-7。Yang, Ji-sheng. 1988. “Gudao de kunjiong guanyu huochai jiage de gushi” [A Story of Tianjin's Price-control of Matches]. *Outlook* 28: 5-7.
- 楊繼繩，1993，〈價格改革：實踐與未來〉，《瞭望》，34：19-20。Yang, Ji-sheng. 1993. “Jiage gaige: shijian yu weilai” [China's Price Reform: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 *Outlook* 34: 19-20.
- 楊繼繩，2009，〈價格改革：經濟改革中的一步險棋〉，《炎黃春秋》，3：18-23。Yang, Ji-sheng. 2009. “Jiage gaige: jingji gaige zhong de yi bu xianqi” [Price Reform: A Risky Move of Economic Reforms]. *Yanhuangchunqin* 3: 18-23.
- 萬民，2004，〈天津 600 年〉，《百年潮》，9：74-79。Wan, min. 2004. “Tianjin liu bai nian” [Tianjin: 600 Years]. *Bananchao* 9: 74-79.
- 趙榮君、吳金星、李長凱，2005，〈本市治安指數八年全國居首：一批先進集體地區個人受到全國表彰〉，《天津日報》，5 月 24 日。Zhao, Rong-jun, Jin-xing Wu and Chang-kai Li. 2005. “Benshi zhian zhishu ba nian quanguo jushou: yipi xianjin jiti diqu geren shoudao quanguo biao Zhang” [National Awards to Tianjin for So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Tianjin Daily* (May 24).
- 趙榮君、吳金星、劉健，2006，〈津城唱响平安曲：本市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紀實〉，《天津日報》，3 月 24 日。Zhao, Rong-jun, Jin-xing Wu, and Jian Liu. 2006. “Jincheng chang shang pinganqu benshi kaizhan shehui zhian zonghe zhili” [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of Tianjin's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Tianjin Daily* (March 24).
- 劉健、吳金星、李長凱，2005，〈全國綜治考核天津被評為優秀〉，《天津政法報》，5 月 27 日。Liu, Jian, Jin-xing Wu, and Chang-kai Li. 2005. “Quanguo zongzhi kaohe tianjin bei ping wei youxiu” [Tianjin'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Management Is Rated Excellent]. *Tianjin Political News* (May 27).
- 蔡文軒，2010，〈解釋中國大陸省級的政治思考：「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44：105-144。Tsai, Wen-hsuen. 2010. “Jieshi zhongguo dalu shengji de zhengzhi sikao: zhengji paixi moshi de sikao” [Explain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 Provinces: A New Perspective from a 'Performance/Faction' Model].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105-144.
- 蔡文軒，2011，〈中共政治改革的邏輯：四川、廣東、江蘇的個案比較〉，臺北：五南。Tsai, Wen-hsuen. 2011. *Zhonggong zhengzhi gaige de luoji: sichuan guangdong jiangsu de gean bijiao* [The Logic of Political Reforms in China: Comparison of Sichuan, Guangdong and Jiangsu]. Taipei: Wunan.
- 蔡孝箴、王鴻江、吳敬華，1982，〈關於進一步發揮沿海中心城市作用的幾個問題〉，《天津社會科學》，6：13-21。Cai, Xiao-zhen, Hong-jiang Wang, and Jing, hua Wu. 1982. "Guanyu jin yibu fahui yanhai zhongxin chengshi zuoyong de jige wenti" [Challenges to Fully Function as a Hub of China's Costal Areas].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6: 13-21.
- 聶壁初，2004，〈天津定位的經過〉，宋杰主編，《天津市十個五年計劃回顧（1953~2003）》：109-1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Nie, bi-chu. 2004. "Tianjin ding wei de jing guo" [Evolution of Tianjin's Development Strategy: 1953~2003]. In "Tianjin shi shi ge wu mian ji hua hui gu" [Review of Ten Five-year-plans in Tianjin (1953~2003)], eds. Song, Jie.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Blanchard Olivier and Andrei Shleifer. 2001.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48, Special Issue: 171-179.
- Burns, John P, 1994. "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458-491.
- Cheung, Peter T Y, 1998. "Guangzhou and Tianjin: the struggle for development in two cities." In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 Mao China*, eds. Peter T Y Cheung, Jae Ho Chung and Zimin Lin. NY: M. E. Sharpe, Armonk:1-31.
- Chien, Shiuh-Shen, 2010. "Economic Freedo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Post-Mao China- A Perspective of Upward Accountability and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 (1): 69-89.
- Chien, Shiuh-Shen. 2013. "Chinese Eco-Cities: A Perspective of Land-Speculation-Oriented Local Entrepreneurialism." *China Information* 27 (2): 173-196.
- Donaldson, John A., 2009. "Why do Similar Areas Adop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 Study of Two Puzzling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60): 421-444.
- Hall, Peter A and Kathleen Thelen. 2009.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7: 7-34.
- Han, Sun Sheng. 2000. "Shanghai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in Urban Transformation." *Urban Studies* 37 (11): 2091-2112.
- He, Shenjing and Fulong, Wu. 2005.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E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 27 (1): 1-23.
- Hendrischke, Hans. 1999. "Tianjin: Quiet Achieve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etitiv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s. Hendrischke, Hans and Chongyi Fe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83-210.
- Knutsen, Wenjue. 2012.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China's HIV/AIDS Policy Process from 1985-2010." *Politics and Policy* 40 (1): 161-192.
- Leng, Tse-Kang and Jenn-Hwan Wang. 2013. "Local State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Innovation Systems: Beijing and Shanghai Compar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0): 219-236.
- Li, Linda Chelan. 2010.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ends, Process and Impact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30 (3): 177-190.
- Lin, George C. S, 2002.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 *Cities* 19 (5): 299-316.
- Logan, John R., Rachel Bridges, Whaley and Kyle Crowder. 1997. "The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Growth Regimes: An 20 Years of Research." *Urban Affairs Review* 32 (5): 603-630.
- Ma, Laurence J. C, 2002.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 (9): 1545-1569.
-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 507-548.
- Molotch, Harvey.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2): 309-332.
- Peters B. Guy, Jon Pierre and Desmond S. King. 2005. "The Politics of Path Dependency: Political Conflict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7 (4): 1275-1300.
- Peters B. Guy. 2012.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ontinuum.
- Pierson, Paul.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thmire, Meg E. 2014. "'China's New Regionalism'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66 (1): 165-94.
- Solinger, Dorothy J. 1996. "Despite Decentralization: Disadvantages, Dependence and Ongoing Central Power in the Inland- The Case of Wuhan." *The China Quarterly* 145: 1-34.
- Wang, Jenn-Hwan and Tse-Kang Leng. 2011.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Space of Production: High Tech Industrial Park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Cross 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E-Journal*, 1 (1):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

- journal/inaugural-issue/production-space-and-space-production-high-tech-industrial-parks-beijing-a (January 1, 2016).
- Wang, Jenn-Hwan, Sheng-Wen Tseng, and Huan Zheng. 2015. "The Paradox of Small Hydropower: Local Govern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1 (11): 1-13.
- Wu, Fulong. 2002. "China's Changing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Urban Studies* 39 (7): 1071-1093.
- Zhang, Le-Yin.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Urban Studies* 40 (8): 1549-1572.

